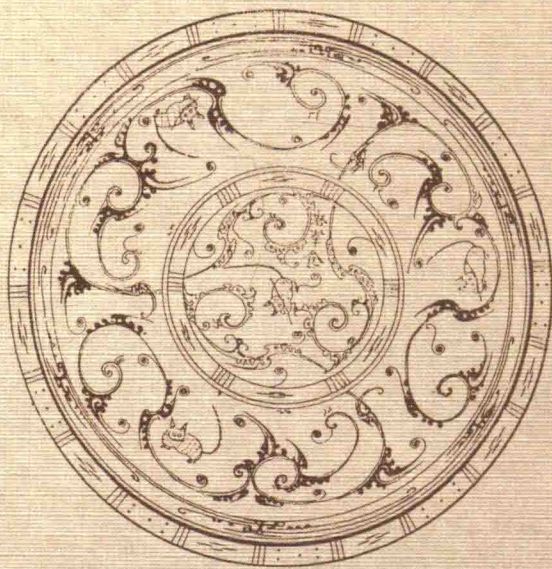

史论与论史

第二卷
(2006—2015)

梁景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史论与论史

第二卷
(2006—2015)

梁景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序

在《史论与论史》第一卷的序中，我大致讲到了自己在2005年以前的学业经历。2005年发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和《关于口述史的思考》两篇文章是我学业走向的又一个新阶段。从那时起，我在社会文化史领域思考了一些问题并撰写了几篇文章，以及参加了一些社会文化史探索的笔谈活动，诸如《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对概念》（《晋阳学刊》2012年第3期）、《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光明日报》2010年8月17日）等。2005年以后的八九年间，我先后出版了《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版）和《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月版）等专著，并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要包括：《清末“尊黄”思潮与民族主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中国近代史分期与基本线索论战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文化开放时代的精神进化——以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文化观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近代转换——论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基本途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嬗变——以婚姻、家庭、女性为中心》（《光明日报》，2009年5月19日）、《西方新文化史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述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中国近代早期国人眼中的欧美生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女性与男性的双重解放——论清末民初婚姻文化的变革》（《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五四以来（1919—1949）社会文化演变及其文明启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等。这一阶段我主编了几套以社

会文化史为主要内容的书籍，主要包括：《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续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社会生活探索》（共 6 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7 月、2010 年 6 月、2012 年 9 月、2013 年 7 月、2014 年 12 月、2015 年 11 月版）、《婚姻·家庭·性别研究》（共 4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 1 月、2012 年 5 月、2013 年 3 月、2014 年 9 月版）、《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共 4 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6 月、2012 年 2 月、2013 年 3 月、2014 年 6 月版）、《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共 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5 月、2013 年 8 月、2015 年 9 月版），并主编大型丛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已出版了五种。^① 此外，我还主编了《中国近代史基本理论问题文献汇编》（上、中、下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版）。

这一时期，我的学业活动还体现在主办学术会议上。先后主办七类学术会议：第一类是从 2011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的“中国 20 世纪婚姻·家庭·性别·性伦文化学术研讨会”，现已举办了五届会议；第二类是从 2010 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已举办了三届会议；第三类是从 2009 年开始举办的“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现已举办了三届会议；第四类是从 2010 年开始举办的“‘文革’史学术研讨会”，现已举办了两届会议；第五类是从 2011 年开始举办的“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现已举办了两届会议；第六类是从 2013 年开始举办的“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现已举办了一届会议；第七类是从 2010 年开始举办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现已举办了两届会议。这些学术会议的举办，有助于自己对相关学术问题的思索。

2014 年我在《近代史研究》第 4 期发表了《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一文，这篇文章是我对社会文化史研究具体问题的再思考，可视为我在社会文化史领域开展工作的又一个新起点。

2015 年 11 月 7 日

^① 杨才林：《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黄东：《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2013 年 4 月版；梁景和等：《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2013 年 9 月版；李慧波：《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2014 年 8 月版；李秉奎：《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2015 年 7 月版。

史论篇

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	(3)
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15)
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对概念	(25)
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	(31)
关于口述史的思考	(50)

论史篇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近代转换

——论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基本途径	(63)
---------------------------	--------

清末“尊黄”思潮与民族主义

——以《黄帝魂》为中心	(73)
-------------------	--------

文化开放时代的精神进化

——以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文化观为中心	(85)
----------------------------	--------

五四以来（1919—1949）社会文化嬗变及其文明启示

——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	(98)
----------------------------	--------

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论纲

——以婚姻、家庭、女性、性伦为中心	(120)
-------------------------	---------

中国近代早期国人眼中的欧美生活

——以《走向世界丛书》为例	(135)
---------------------	---------

女性与男性的双重解放

——论清末民初婚姻文化的变革	(148)
----------------------	---------

共和国三十年的性教育（1949—1979）	（165）
-----------------------------	-------

史评篇

中国近代史分期与基本线索论战评述	（177）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述论	（195）
西方新文化史述略	（207）
炽盛与深化	
——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五年历程（2010—2014）	（216）
生活方式：历史研究的深处	
——评李长莉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	（232）
大视野中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读龚书铎先生著《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中国近代文化研究》	（258）
编辑视阈下的史学与史家	
——读马宝珠的《说不尽的历史话题》	（270）
《英雄的悲剧——李秀成心理分析》序	（274）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另一个视角	（282）
《当代中国口述史：为何与何为》序	（285）
《21 世纪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建构研究	
报告集成（2001—2012）》序	（288）
《县域视野下的农业合作化与乡村社会》序	（292）
《清末民初中国人视域中的美国》序	（296）
附录 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	（299）
后记	（311）

史 论 篇

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历史学，发生变化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研究领域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史与社会史再度复兴而成为显学，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文化史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引起部分学者的兴趣。^①但是社会文化史作为人们新的关注点，还需要史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力求在理论方法与史料方面有所突破。本文是对社会文化史几个问题的一个思考，希望学界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 社会文化史的概念及研究对象

美国史学家林恩·亨特（Lynn Hunt）于1989年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首次举起“新文化史”的大旗，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亨特曾经指出，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

^① 参见刘志琴（署名史薇）《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载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① 新文化史又被称作“社会文化史”，它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史学流派。

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② 一个社会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决定的；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变化引起了哪些思想观念的变化；由于新思想观念的影响使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一切都是社会文化史要研究的问题。

研究社会文化史涉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大众本身的内涵是通过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和法权的地位来确定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些因素也不断地发生变化。西方学术界认为，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它是为大众服务的；而精英文化却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也有人称之为“高级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虽性质各异，然它们的不同因素又被整合成为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因而简单地划分的确难以包容复杂的文化内涵。研究者容易忽视的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大众”和“精英”的含义也随之变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报纸杂志和其他大众传播工具是精英文化，然而在今天却是大众文化；意大利歌剧在如今美国和中国都是精英文化，然而在意大利却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创造者也不断改变其角色，并大有“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相结合之势，以至于今天一些研究美国大众文化的学者认为，现代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是知识分子，因此大众文化的历史便有着“必然亦是知识分子的历史”的趋向。^③ 精英文化源于大众文化，是从大众生活和文化中产生，是对大众文化和意识的提炼和总结。精英在社会文化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精英文化同时又是对大众生活和大众文化的体认、关注和指导。所以研究社会文化史既不能脱离大众文化亦不能忽视精英文化。

研究社会文化史要注意社会文化与国家意志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包

① [美] 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薛绚、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② 笔者在《我为什么要研究近代陋俗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一文曾表述“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

③ 王迪：《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两者的相互影响和可容性。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治生活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使得社会生活带有明显的政治特色。这种政治特色又被相当数量的民众所认同和接受，形成了两者的互动和相容。其二，两者的对立性。如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精英把社会陋俗及国民劣根性视为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因此大众文化领域同时成为现代化机器的打击目标。现代化的推动者包括精英和国家都不同程度提出了反封建陋俗和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张力引起了社会文化的变革。这反映了社会文化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对立性。

注重研究社会运动的社会文化意义。社会运动所揭示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形态是社会文化史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和宗教信仰的关系，近代社会的反洋教运动，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大跃进”运动，红卫兵运动，四五运动，新时期的学潮等等，这些都可以从社会的文化与政治的视角进行探索，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进行研究。

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注重层面和角度，而层面和角度又是多维的。要考虑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也要考虑不同地域的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还要考虑不同民族在相同时期内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并探讨这些变化的缘由所在。

社会文化史要特别注意研究已经发生变化的部分及其变化的程度。社会文化一般存在两种状态：一是恒常状态，一是变化状态。绝对的恒常状态是不存在的，恒常状态是相对的，但即便如此，恒常状态还是社会文化的底色。然而变化状态在改变着这一底色，改变的程度与变化的程度成正比。我们要注重研究社会文化的变化状态。对变化状态的研究有益于对当时社会特点的认识和理解，即有助于对某一历史时期特征的认识和理解，这正是我们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所以研究社会文化的变化状态是社会文化史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 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

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本文重点阐述以田野调查法为重点的对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

文化人类学在理论上颇具特色。西方人类学自形成以来,先后创立过多种不同的理论,影响较大的有进化理论(分为古典进化论和新进化论两种)、传播理论、历史特殊论、功能理论、文化模式论、结构理论、象征理论等。古典进化理论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是探求人类文化起源、发展和演化的一般规律的理论,以解释当时世界各民族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差异悬殊的原因。传播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主要由德国、奥地利和英国的学者创立。它与进化论唱反调,强调文化传播在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以文化传播原理解释世界各地、各民族文化的相似性。历史特殊论形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美国学者创立。该理论认为各种文化是各个社会独特的产物,相似的文化现象实际上都有其各自发展的历史线索;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主张要了解人类一般文化的成长法则,首先要研究各种文化单独的演变过程;强调对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材料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每一个民族或部落的具体资料重新构造其特有的文化历史。功能理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由英国学者创立。它强调从整体上研究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文化,并重视对现实存在的社会制度的实地调查研究;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功能的、有机的统一体,各种文化要素正像一个机体的各种器官,各有其功能,共同维持一个整体的存在。有的学者认为功能主要是指人的需求的满足,即人的基本需要(生物性需要)和派生需要(心理性需要)的满足;有的则认为功能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相互调和,使其整体持续保持稳定和一致的状态。文化模式论或文化与人格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学者创立。它主要解释各民族的性格为什么存在明显的差异,解释男女两性为什么在气质和性情等方面存在差异。结构理论或结构主义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由法国学者创立。该理论认为,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分析纷乱繁杂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表层结构,探索存在于不同时空的深藏于人类心灵中的普遍性结构,以认识、解释全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为总原则。象征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由英国和美国的学者创立。该理论认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文化功能或结构的分析,而是解决各种文化现象和行为所表达的信息或意义;主张把象征及其意义作为文化的核心进行研究,寻

求象征的多层次理解。^①

文化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田野调查法即实地调查法，是文化人类学最有特色的方法之一，也是收集资料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是人类学最明显的特征，当然也是相关学科如考古学、社会学和语言学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的主要步骤：^①田野工作的准备。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干什么去？去何处？从事田野工作是要阐述某些理论问题或假说，这比为了描述更为重要。要到典型的地方或找有代表性的人。要考虑的因素有：可进入性、健康状况、政治可行性、生命安全等等。还要备好考察的装备，包括衣食住行和全套的野营器具以及药品和补给品。^②开始田野工作。要根据不同的背景采取不同的策略，不能一概而论。首先遇到的是长途跋涉的艰苦。没有地图，远离电、冷饮、抽水厕所、舒适的床。面临着不同文化的令人痛苦的“文化冲击”，孤独无援，深感压抑，第一个冲动就是逃离。吃饭也是大问题，能买到东西吗？能用所带的物品换食物吗？当地人是否会用“暴力”欢迎来者，也是令人忧虑的。要向当地人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此的目的，不能对提供资料者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③语言学习。世界共有一千多种语言。学习当地语言，通常既无词典又无语法。通过聆听和询问来学习语言，要6个月或一年时间才能应付详尽的采访或参加群体交谈。^④参与性观察。生活于要研究的人之中，参加他们的社会生活，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懂就问。^⑤采访。实际的采访技巧视研究者与所需资料的种类而定。有些按严格的提纲提问，同一问题可以去问许多人，而有些则可让提供资料者随心所欲地叙说。还有一些或许从某个主题开始，然后由着对象去说，在他离题太远时，再不时将他引回到原先的主题上。^⑥解释。田野工作的最后解释受研究者的人格、养育他们的亚文化、他们的政治观点、培养他们的理论学派等深刻的影响。^②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了解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的几个重要步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或为我们所用。

前辈学者和当代学者的实践经验我们也应当有所继承。阅读费孝通的《社会调查自白》，就可从中受益。费孝通1984年7月23日到8月4日的

^① 参见何星亮《人类学的研究和发展》，《光明日报》2001年10月23日。

^② 参见〔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吕乃基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64—281页。

两个星期里，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的暑期“多学科学术讲座”里作了有关社会调查的讲座，后来以《社会调查自白》为书名出版。在本书的“引子”里他介绍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和多学科的基础知识。在本书的“社会调查概述”中大致介绍了社会调查的四个阶段：①定题。即要确定一个调查的主题。定题并不简单，题目从哪里来，又如何去选择，就像我们的论文选题一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②制定计划和方案。这与我们传统史学所制定的方案有所不同。需要进行探索性调查。要搜集与课题有关的资料，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拟出调查提纲，明确调查指标，确定调查方式。③实施阶段。相当于我们的查阅资料。采用观察与访问的方法。观察包括“间接观察”、“直接观察”和“参与观察”。访问是指收集被调查口述资料的调查方法。④总结阶段。相当于我们的撰写论文。通过整理资料、分析资料而得出结论，是围绕着“点与面”、“质与量”、“因与果”这三个关系展开的。在本书中，费孝通重点介绍了如何进行民族调查、农村调查、家庭调查、小城镇调查、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的调查。^① 费孝通的研究方法显然值得重视和借鉴。另外，20世纪30年代陈翰笙教授对华南农村的研究，陈达教授对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的研究，陈序经教授等对疍民的研究，都是以小社区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当代中国学者也有将人类学的方法积极运用于社会史研究，把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紧密结合起来的有益尝试。另外，《新时期史学思潮》一书是利用访谈方法进行研究的一个范例。本书的前言指出：“当代史学思潮的研究有赖于当代史学工作者广泛的参与。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可以由某位史学家通过搜寻史学史的文献来进行独立的研究。而进行史学思潮的研究，仅仅靠坐在图书馆中搜集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只能真正深入到广大史学工作者之中，了解他们自己走过来的道路，倾听他们对史学研究的种种感觉、体会、意见、呼声。在他们的业绩之中，寻找他们的成功之路；在他们的困惑之中，探求解脱困境的出路。广大史学工作者自己的现身说法，才是研究当代史学思潮最宝贵的资料。因此，这项研究非有广大史学

①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工作者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不可。”^① 本书的后记也指出：“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一点，那就是史学研究是广大史学工作者辛勤工作的结果，史学思潮的形成，必然与广大史学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离开了对这些史学工作者本身的研究，就谈不到史学思潮研究。所以，我们的课题研究，并不是在开始研究前就确定了明确的研究路径，而是我们在逐步深入到史学工作者当中之后，才逐步明确的。也可以说，这项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研究，不只是我们三个人的工作成果，而是我们与数十名老中青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共同劳动的结果。”^② 作者通过访谈，感受到了当代史学思潮跳动的脉搏，也体察到了当代史学工作者的辛勤劳作和敬业精神。作者若能把访谈的资料整理出版，将是一部有价值的当代中国的口述史学。

三 社会文化史的史料问题

上文谈到的田野调查法实际也是从事社会文化史研究搜集资料的方法之一。当然研究社会文化史还要有更为开阔的史料视野。除我们以往关注的一般史料诸如正史、档案、报刊、方志、访谈资料等外，社会文化史还要关注更为宽广的史料范围，诸如被目为野史稗乘的笔记、小说、戏曲、诗歌等。有学者指出，“浩瀚的史书和数不尽的文物遗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意识，看问题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资料，最为丰富、生动，有待人们去整理、发掘”。^③ 其实，很多前辈学者在挖掘和运用史料方面，作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尝试。

著名学者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都非常重视对戏曲小说的研究，有的写出戏曲和小说的专史；有的则侧重于发掘戏曲小说中的史料。新中国成立前后，郭沫若、翦伯赞、尚钺、胡绳、邓拓、吴晗、傅衣凌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翦伯赞在新中国成立前写的

① 邹兆晨等：《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② 同上书，第330页。

③ 刘志琴：《青史有待垦天荒》，《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13—14页。

《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元曲新论》、《桃花扇底看南朝》和新中国成立后写的《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释〈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琵琶记〉的历史背景》等文是对戏曲小说的研究成就，主要是形成了一套搜集和分析史料的治学方法。注重文学资料的使用，并把视角深入到戏曲内容之中，藉以观察这些史料中包含的社会文化价值。染指过去文学史和戏曲史的领域，延伸了历史学家的触角。当然引用文学资料研究历史必须抱十分审慎的态度，要充分认识到作者的写作不是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反映，而是经过了再创造的过程，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大量“臆造”的成分。因此，当没有其他有力的资料作旁证时，在论述问题的时候必须时刻注意到自己的立足点，并充分警觉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如采用文学作品分析晚清大众文化时，必须分清所讨论的就“是”晚清大众文化，还是作者笔下所“反映”的晚清大众文化。比如利用晚清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来研究晚清的社会文化，要考虑小说内容是如何折射社会现实的，这种折射和直接反映是不等同的。清末小说杂志《绣像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其实清末有很多种小说杂志）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民众的民俗信仰生活。另外，文艺作品对民众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素质的提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作品的内容去梳理探究，未尝不是可尝试的分析方法。20世纪的女性文学以及当代文学作品也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另外，我们还要注意搜集和使用民谣。如《中国近世谣谚》和《现代流行民谣》等都是重要的社会文化史史料。

诗文同样可用作史料。陈寅恪成熟运用于学术研究中的就是我国传统的文史互证方法。这种方法被现代学者所继承，并在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当代学者卞孝萱的《冬青书屋笔记》，揭示了传统文史互证方法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 and 意义。^①当代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阁师：17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1995），主要用17世纪江南地区上层妇女创造的诗文来分析她们的生活状况和当时的社会风貌。曼素恩（Susan L. Mann）的《宝卷：在漫长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妇女》（1997），将

① 郝润华：《文史互证方法的当代学术意义》，《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妇女自己写作的诗词作为立论的材料。对于西方学者来说，能够解读中国诗词已属不易，这种做法也确实使读者耳目一新并颇具说服力，但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特点，讲究情感表达的含蓄蕴藉与复杂委婉，女性诗人尤其如此，用来作为史料，即使特别小心，也很难保证不会出错。^①

史料是丰富多彩的，如何阅读史料是重要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个‘读’不仅是讲对资料字面上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从什么角度对资料进行诠释和利用。一条史料不仅反映了某个历史事实本身，而且可能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内涵。正是对资料怎么‘读’，常常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所持的历史观”。^② 我们在扩大史料视野的同时，更要学会阅读、分析和理解史料。

四 重视研究 20 世纪的社会文化史

当代史学界在展望 21 世纪史学时，认为在 21 世纪的史学研究中，近现代史特别是 20 世纪的历史将会受到特别的重视。戴逸在 1996 年就指出：“在下一个世纪的历史研究中，近现代史将更加被重视。尽管尘埃尚未落定，盖棺犹难论定，但人们惯常要回顾刚刚走过的那段路程，迫切地希望从刚刚逝去的历史中寻找经验，获取教益，增长智慧。21 世纪的历史学亦将以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及其事件、人物、思想、典制为重要内容。20 世纪，中国贫困、屈辱进而抗争、奋起，富有慷慨悲壮、可歌可泣、催人前进的内涵。人的苦难、人的价值、人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21 世纪的历史学将透视、描摹、再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给后代以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教育。生活在 20 世纪的人们尽管亲历了种种事变，有着切肤的感受，但历史的表面尘雾把它们笼罩其中，反而看不清眼前事变的整体和意蕴。而 21 世纪的历史学则会将它们完整地、准确地揭示出来，像悬挂在天空中的大幅画卷，显示其磅礴的气势、雄伟的场面和丰富的意蕴。”^③ 的确，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了。

① 定宜庄：《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 年第 9 期。

② 王迪：《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③ 戴逸：《中国历史学如何走向二十一世纪》，《光明日报》1996 年 12 月 31 日。